

论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

陈 祖 华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它曾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并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它同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因此,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深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认真探索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宝贵贡献,无论对于我们继承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以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是在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要探索、判断、了解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深刻理解这些贡献的价值,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作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就一点也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离不开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的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之中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本质、主流、规律性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是中国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继承与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进一步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以及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一,继承与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并使其得到了新的说明与发挥。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③二十年后,毛泽东同志又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④本来,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相当广泛,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立统一规律上呢?除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外,现代中国的国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实践的需要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各国竞相侵略、掠夺和瓜分的对象。加之我国新的阶级矛盾已经出现,而旧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使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内外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它不仅比“阶级对立简单化”^⑤的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复杂得多，而且比具有“多级的阶梯”^⑥的封建社会也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指导中国革命并把它引向胜利，就一刻也离不开对我国社会矛盾的科学认识与正确解决，而对立统一规律则提供了认识与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的锐利武器。所以，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运用与发展，决不是偶然的。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实践的需要，这个道理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也同样是适用的。

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的论点：一是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二是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的钥匙。

在谈到第一个论点的时候，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⑦毛泽东同志把列宁的这些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透彻地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集团、各派政治势力经济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分析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与联合，深刻地揭示了我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理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近代思想家、资产阶级民主派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批判了庸俗进化论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

在谈到第二个论点的时候，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间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⑧列宁自己，曾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和说明量变质变。比如他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就把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视为对立面的转化的实例。但是，列宁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着力于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解释和说明量变质变与否定之否定。

毛泽东同志主要是在论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时候，着重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解释和说明量变质变的。概括地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方面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1. 矛盾双方的斗争引起量变。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战争这一事物的时候，并不停留于它的直接性，而是深入本质，分析矛盾双方在斗争中的量的变化。他在分析矛盾每一方量的变化时，不仅指出“向上”的变化，而且指出“向下”的变化。2. 矛盾双方的转化就是质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有两种情形，一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一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与此相适应，事物的发展则呈现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状态。这里撇开同一性的内涵究竟应该怎样规定，毛泽东同志把质变视为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则是十分明确的。3. 在由量及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量与质的交错变化、旧质与新质的转化和代谢。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不仅分析了中日各方量的“向上”和“向下”的变化，而且分析了中日各方质（包括旧质与新质）的“向上”和“向下”的变化，并且把它们综合起来，预言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中日双方的态势。4. 用矛盾学说论述了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质变，即许多哲学教科书称之为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的那些思想。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丰富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并且在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证明，成功地解释了我国民主革命从小块根据地的建立到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转变，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探讨，切不可轻率地、简单地加以否定。

毛泽东同志在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和说明肯定否定的时候，指出一切事物均包含肯定与否定，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论述了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指出了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对于面临强大敌人的中国人民正确地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艰难

险阻，夺取革命胜利，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和说明辩证法的其他成对范畴，如可能与现实、全局与局部、统一性与独立性，等等，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理论内容。

第二，进一步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

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已初步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同志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这里我想简单地论述一下毛泽东同志所展开的各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

（一）毛泽东同志继承与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理论，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⑥，指出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根本分歧的焦点，阐述了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与前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解决这系列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我们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有不少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有些人甚至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农民难于参加革命，工人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革命胜利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事。于是，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定农民运动，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行为一再妥协退让，以至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上述错误之所以发生，其认识根源，在于他对中国的国情，即对我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基本矛盾，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陈独秀根本不懂得“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则不同。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原稿的提法）；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⑦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任务与前途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以及科学地看待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以及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辩证法，反映了中国革命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成果。

（二）毛泽东同志在进一步展开对立统一规律各个方面的时候，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的运用与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明确地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论述，这对于正确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总结我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实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取得革命胜利，对于丰富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内容，都具有重大的

意义。毛泽东同志把矛盾普遍性规定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把矛盾特殊性从物质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以及过程、阶段的矛盾诸方面加以论述，从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从我国民主革命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看，这些规定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理论运用于分析形势，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我党及时地正确地提出自己的斗争任务，完成各个时期的策略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论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思想，论述了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公式，发挥了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论反对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特别是清算了教条主义，使我们党、民族和人民多次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为中国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向我们党提出的一个极为紧迫、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把革命推向前进。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中国不能走俄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而必须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果。然而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三次“左”倾路线，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从本本出发，只知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我国的特殊性，不懂得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与中国革命道路相联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和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时候，要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指导我们取得了反围剿的多次胜利。与此相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无视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只知照抄照搬一般的军事条令，照搬苏联内战的经验，结果丢掉了大片根据地，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期，中国革命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我党应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基本矛盾与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理论，分析了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克服了我们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以上我们简略地谈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然而它们在理论上都有共同性，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正因为毛泽东同志通晓辩证法，最善于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因而能够正确地解决上述问题。而“左”倾机会主义之所以错误，从认识上看，则在于他们不懂得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总结了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

（三）毛泽东同志在展开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时候，继承了列宁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思想，着重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以及对抗与非对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并教导人们在研究矛盾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②，注意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别，防止过火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我们党内出现了否定“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否

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他们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讲统一性，不讲独立自主。在纠正了统一战线中右的错误倾向以后，我们党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开始出现的“左”的倾向。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无论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还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都不懂得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而综合联合与斗争的政策，则体现了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

（四）毛泽东同志在展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并指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⑩。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突出的发挥。

还在我们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⑪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不仅是我党二十年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的体现。

以上我们简略地论述了毛泽东同志所展开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展开这些方面的时候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亦即关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比如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去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与前途；从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一根据出发去论述中日双方的特点、中日战争发展的各阶段以及战略战术；等等。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展开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展开了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就要进一步研究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⑫这就是说，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根据，矛盾的存在及其特点，应由它自身的生命和活动来进一步加以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分析了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以后，用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来概括矛盾学说，把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视为矛盾问题的精髓。

由此看来，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主要表现在：（1）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辩证法的主要原理和范畴，概括地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问题。（2）毛泽东同志展开对立统一规律各个方面的过程，大体上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3）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对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与中国革命历史的一致，必须作辩证的理解，而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理论不等于历史，它必须摆脱“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⑬

第三，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提出了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以及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与前途；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原则；阐明了党内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论述了战争中的矛盾及其对矛盾的把握，敌我双

方的特点在战争过程中的展开，战争发展的各阶段及其特点，战争的主要形式及相互关系，战争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量变与质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政治与军事，人与武器，战争中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问题。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工作，把辩证法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自始至终的分析矛盾，两分法、两点论，多谋善断、不失时机，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承认差别、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抓中心工作，抓重点、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抓三分之一，胸中有数，留有余地，从坏处着想、向好处争取，波浪式前进等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还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建设，论述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整风与生产、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以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大大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宝库，每一个领域都可以独立地构成一门科学。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人类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毛泽东同志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而中国革命又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这就使得毛泽东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加之毛泽东同志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优秀传统，更使得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更易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毛泽东的辩证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广度和深度，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理论宣传上，林彪、“四人帮”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恶劣作法必须摒弃，但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肯定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宝贵贡献，不仅必要，而且是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

在纪念我们伟大的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我们党在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继续，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①② 列宁：《哲学笔记》第407、240页。

③⑨⑩⑪⑫⑬⑭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276、4、307、311、295、28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⑤⑥ 《共产党宣言》第24页。

⑦⑧ 列宁：《哲学笔记》第408页。

⑭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3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